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404

传教士到外交官：卫三畏对日本开国进程影响探微

叶芷辰¹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19)

摘要: 随着19世纪中叶全球秩序重构, 西方列强加剧了对东亚地区的窥视, 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 传教士作为非官方群体, 自发显现出文化、宗教、科技传播、外交等方面的作用。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凭借其对于东亚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成为日本开国这一历史巨变的亲历者, 同时也拓展了西方传教士群体在东亚地区的社会边界, 推动日本的开国进程。

关键词: 近代东亚; 日本开国; 传教士外交; 卫三畏

卫三畏 (Samuel Wills Williams) 是美国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 其生活的时代正值日本德川幕府晚期和明治维新时期, 这是日本从锁国走向开国的重大历史转折点。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卫三畏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汉学家”身份, 而忽视了其代表的“传教士”这一非官方群体在日本开国进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本文以卫三畏1837年“马礼逊”号之行及两次随行佩里舰队访日的经历为切入点, 探寻传教士卫三畏对日本开国进程的积极影响。

一、漂流民与卫三畏赴日缘起

1833年10月25日, 卫三畏受美国公理会派遣, 乘坐“马礼逊”号抵达广州黄埔港, 与传教士裨治文一起负责《中国丛报》的刊发与印刷, 将远东地区的信息翔实、客观地传递回西方世界。在东印度公司撤出中国后, 清政府失去了重要的贸易伙伴。由于担心传教士过度传播西方的思想文化, 影响清朝的统治秩序, 清政府加大了对传教士的限制, 卫三畏和他的印刷所迫于形势转移到时属葡萄牙管辖的澳门, 这也为他结识3名借住在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家中的日本漂流民并学得简单日语结下因果。1837年3月, 又有4名漂流民被解送至澳门, 经过与他们的交谈, 卫三畏开始热心关注日本这一“不为外人所知的土地”^[1]。在《中国丛报》投资方、同孚洋行商人查尔斯·金的提议下, 1837年7月4日, “马礼逊”号以交还7名漂流民为由, 自澳门驶往日本。由于卫三畏在伦塞勒理工学院就读期间曾修习植物学相关知识, 被邀请作为自然学家加入此行, 同行的还有具有医学背景的传教士伯驾, 郭实猎则充当本次行程的翻译。为了向德川幕府示好, “马礼逊”号没有搭载任何武器装备, 而是准备了大量的药品及科学仪器^[2]。卫三畏在行前写给父亲的信件中提及, 此次访日目的是送漂流民回国, 同时希望和日本人建立友好往来, 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为他们治病, 以及做一点生意^[1]。因为担心外国船只进入日本, 会带来很多麻烦, 比如威胁日本的安全、传播疾病、扰乱市场等, 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签发了《异国船打拂令》, 日本水军奉命炮击驱逐

¹ [作者简介] 叶芷辰 (2000—), 女, 辽宁沈阳人, 东北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主要进行国际视阈下的东亚研究、德川时代日本研究。

[基金项目] 2024年辽宁省科学事业公益研究基金 (软科学研究) 计划项目“新时代背景下辽宁国际科技合作问题与对策研究——东亚地区科技合作问题与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 2024JH4/10600046) 阶段性成果。

所有接近日本沿海的外国船只，“马礼逊”号试图两次登陆都遭到了炮击，吃了闭门羹，也未能在日本得到补给，行程以失败告终。

“马礼逊”号访日之行的失败并未熄灭卫三畏向日本传教的热情，反而激发了卫三畏关注日本、研究日本的热情^[1]。同时，卫三畏认识到对日本这个东方岛国了解不深入，对船载药品、满怀善意的“马礼逊”号以岸炮驱离很不理解。其实，早在1825年幕府就颁布了《异国船打拂令》，一切非中国、荷兰的船只靠近日本海岸都会被驱逐，但是他作为《中国丛报》这一东亚地区面向西方窗口的主要编辑人员并不知晓这个法令。因此，从记载“马礼逊”号日本之行的 Voyage of the Ship Morrison to Lewchew and Japan^[3]一文刊发后，《中国丛报》中有关日本的篇幅逐渐增多，包含查尔斯·金、裨治文、郭实猎等人关于日本航海、外交、宗教政策等方面的论述，其中 Notices of Japan 一文分十次连载，以期让西方世界对日本形成基本完整的认识，截至佩里舰队启航前，有关日本的论述已达到18篇之多^[4]。在漂流民的教学下，卫三畏的日语能力得以迅速提升，先后将《马太福音》《创世纪》翻译成日文，并吸收发展了至少2名漂流民为基督教徒。这也为日后马休·佩里选择卫三畏作为远征舰队首席翻译，使其传教士身份向外交官转换埋下了伏笔。

二、翻译到传教士外交官

1844年，美国逼迫腐朽的清政府在澳门签订不平等的《望厦条约》，美国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任意租地盖房，享受特权，其兵船可以在各通商口岸任意出入。顾盛使用裨治文、伯驾、卫三畏等人作为使团成员参与秘书、翻译、帮办有关中文函札等工作，卫三畏也是美国早期在世界东方推行强盗外交的直接参与者，顾盛称赞卫三畏等人“对中国有广博和准确的认识”、在“修约”过程中“功勋卓著，值得称赞”^[5]。1848年美国捕鲸船拉哥达号在太平洋西北海域失事，幕府将15名船员扣押在长崎，翌年普雷布尔号不顾幕府警告驶入长崎港，逼迫日方交还了失事船员。1851年，普雷布尔号的格林舰长向美国政府提出远征日本的建议，他推荐的舰队领航人就是海军准将马休·佩里。回顾历史，黑船事件推动日本开国，美国适时扩展了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此后，其将日本作为重要军事战略基地的野心始终未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美国人仍然以第一岛链的强盗逻辑巩固着其全球霸权的重要战略支点。

虽然当时锁国政策已走向穷途末路，但幕府并未打算主动开国，在佩里舰队出发前一年，荷兰政府得知美国政府即将派遣佩里准将敦促日本开国，并多次向幕府发出警告，幕府却置若罔闻。时任荷兰商馆馆长库尔丘斯奉国王之命，欲呈上荷属印度总督的文书，却被幕府当局以违背祖法为由拒绝接收，于是在《风说书》中阐明了美国政府将不惜使用武力手段促使日本开国的情报，并愿意亲自向幕府禀明^[6]。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已经提前1年通过荷兰人告知日本幕府美船来航事宜^[7]，但是幕府并未将《风说书》情报当作两国政府间的官方接触。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卫三畏作为曾参与过美国早期东亚外交、对远东地区特别是中日两国都具有较深的认知、且曾参与“马礼逊”号漂流民送还行程的“东亚通”，迅速进入佩里准将的视野，并取代与荷兰联系密切的冯·西博尔德成为远征舰队首席翻译的不二人选。

卫三畏乘坐萨拉托加号在琉球那霸港与佩里舰队会合后，先后参与到舰队在琉球群岛、奄美大岛的外交及自然考察活动中，且作为翻译陪同参与琉球王室的会晤。虽然此前佩里准将邀请卫三畏加入舰队时声明“不含任何战争或侵略动机”，虽然随着舰队启程前往浦贺，卫三畏开始对远征的真实目的产生质疑，从此阶段日记中“真诚地希望所点燃的仅仅是炮火而不是战火”的表述可见卫三畏对佩里准将主张“武力解决问题”的担忧^[1]，但是在卫三畏7月16日写给W·F·威廉斯牧师的信中“我主基督也希望能通过我们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把他的教诲传给日本民族”的表述可以看到卫三畏为了纠正日本民族当前对基督教“完全歪曲”的认识，认为应该采取强硬措施迫使日本打开国门，使日本人获得自由^[1]，但是这里的强硬措施并非武力手段。从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卫三畏不仅是一位随队翻译，还是一位深受宗教动机影响的外交官身份的传教士。在宗教动机与现实利益相矛盾时，他试图在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同时实现对日本政策的影响，但并不完全排斥使用武力。在第一次远征返航途中，卫三畏正式坐上谈判桌，作为谈判代表

为美国争取到在琉球获得补给的权利。虽然这一次赴日仅仅驻留了九天，且随船携带的荷兰语翻译作用更甚，但是卫三畏负责了翻译总统信函、检视往来信件等重要工作，为第二次赴日谈判修约做足了准备。

卫三畏回到澳门后重新投入到印刷所的事务中，继续从事他的传教事业。基督徒洪秀全受郭氏译本《圣经》影响，笃定称历代皇帝为“帝”是对上帝的僭越^[8]，于1853年高举着《圣经》，率领太平军打入南京城。“这场以宗教为武器、奉上帝旨意行事”^[1]的太平天国运动让传教士们看到了在东亚地区传教的希望，英国圣经会更是筹集了足以免费在华发放20年《圣经》的经费。卫三畏认为太平军的号召力来源于“公平买卖”，即人们对于民主自由的希望，且“上帝征服东方的时刻已到”，随着锁国状态被打破，将有更高的目标、更多的知识和希望光临这片土地。受历史局限，他还看不到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动摇腐朽没落的清政府统治基础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更没办法理解太平天国运动所提出的平分土地、男女平等的“普世价值”，作为传教士，他更关心如何为上帝传播福音。当佩里舰队第二次启程前往日本时，卫三畏在《神奈川条约》的修约过程中发挥了“智库”作用，完成了翻译到传教士外交官的华丽转身。至此，以卫三畏为代表的传教士外交官这一在19世纪中美关系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体开始参与美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外交进程，为美国获得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利益提供了坚实支撑^[9]。

三、卫三畏对推动日本开国进程的影响

日本开国是一个渐进的、由资本主义国家全球扩张的趋势、幕藩体制的松散性、国内阶级矛盾的升级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等因素驱动的复杂过程。自“马礼逊”号送还漂流民事件伊始^[10]，佩里舰队的两次叩关、《神奈川条约》的签订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日本开国的进程，而在这些重要节点中，卫三畏始终承担其翻译和传教士外交官身份对应的责任，在推动日本开国过程中发挥了多重关键作用，其影响力贯穿了从“马礼逊”号事件直至佩里舰队成功迫使日本签署《神奈川条约》的整个历程。佩里准将在远征结束后给卫三畏的评价是，“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对你在执行托付给你的重任时所表现的才干、热情和忠诚给予最充分的证明。我只想说，在这一必须审慎对待的事务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你的帮助对我来说几乎不可或缺。”^[11]

卫三畏对日本开国的影响涵盖了多个层面，从信息的传递、外交策略的制定与执行、谈判桌上的翻译，到个人魅力的展现以及身份的转变，对日本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乃至美日两国长期关系的构建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卫三畏是构筑美国与日本之间信息桥梁的关键人物。作为最早一批将目光投向日本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对日本的深入了解为美国提供了宝贵而及时的战略情报。他参与编辑的《中国丛报》中有关日本的系列文章为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提供了关于日本的最早期且较为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为美国决策层制定对日政策提供了依据，也为佩里舰队远征日本提供了必要的情报准备和策略参考。

其次，在制定与实施相对温和的外交策略上，卫三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日本近代的锁国行为是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一种自我封闭，是对于外来文化的主动选择，并非全盘否定^[9]，这一点体现在幕府保留了荷兰人的通商权利，并在出岛设立荷兰商馆定期收取《风说书》以了解世界动向。卫三畏深知日本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对外来事物抱有警惕心理，因此在协助佩里制定外交策略时，既坚持美国的经济与战略目标，也充分考虑到日本的国情与文化特性，采用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温和外交策略。展示的是他这个“中国通”的上兵伐谋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展示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逐步引导和胁迫日本接受开放而非单纯依靠武力征服。在实际操作中，卫三畏运用娴熟的外交手腕，针对日本民族好奇心强的特点，设计了一些沉浸式新鲜体验。如：在展览舰队赠送的礼物时教会日本工人完成电报机组装，邀请当地官员及民众们一同观看包含英文、荷兰文和日文的信息“瞬间”传递到另一座建筑物的场景，并且铺设了一条时速20公里的小型铁路供参观。虽然幕府因舰队和当地人的接触感到紧张，但是日本民众对美国人带进来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小巧的机器、方便的新发明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种自下而上的交往展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锁国体制带来的排外反应，另一方面将美国和日本之间科技水平的差距以实物方式展现

出来。这种方式对于让日本幕府和民众放下戒备心理相当见效，适时结合佩里舰队强大武力震慑的外交策略，在不直接行使武力的条件下即让美国的政治家们心遂所愿。

在谈判桌上，卫三畏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纽带作用。他精通中文，擅讲日语，能够准确传达双方意图，消弭语言障碍。卫三畏站在美国立场上，让日本人感受到的是，美国人充分理解并尊重日本的现实利益，并以灵活的谈判策略协调双方立场，使得看似难以调和的分歧最终在条约中达成共识。在交给特使林复斋的文书中，卫三畏指出，美国送来先进的设备及说明书是为了打消日本人心中“对两国自由交往所存的担忧”，如果日本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机械，并允许国人外出学习，必将大有收获^[1]。特别是在《神奈川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卫三畏成功说服日本接受了一些比较隐蔽的“丧权辱国”条款，如第九条中“嗣后日本幕府倘以今不相允于合众国之事、与他海外诸国相允、则亦应同允之于合众国、毋庸迟缓待议也。”的表述体现了美国要求永久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若将其和美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相对比，不难发现以类似诱骗欺诈合同条款的方式攫取诸多非正当权益，是美国外交的一贯伎俩。卫三畏毕竟是一名美国人，他为当时美国疯狂拓展在东亚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神奈川条约》的签订为西方列强开辟了与日本“条约外交”的先河，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开国的进程，进而使日本走上全盘西化的快车道，也沾染了强取豪夺的帝国流氓习气。

卫三畏是出色的外交官，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一定贡献，受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浸染，在华多年的传教士生活和全面而深入的汉学研究使他具备了独特的文化敏感性。他毕生信奉基督教，也喜欢中国的儒家思想，两者的精神内核大致上都是“仁爱”，这也深刻的影响了他的外交思想，形成了相对温和的外交风格。他在传教、外交工作中提倡“孔子+耶稣”^[12]的模式，可见卫三畏对儒家学说的高度认可^[13]。他的这些思想积淀和性格特质在远征日本的整个过程中得以充分显现，有助于缓和谈判桌上的紧张气氛，增进彼此的理解与信任。如在与日本天皇特使会谈时，日方提前在海滩上搭建围帐包裹谈判地点以示尊重，不了解日本待客之道的佩里对此大为光火，派遣卫三畏和亚当斯上校前往交涉。卫三畏并未传递佩里准将的愤怒，而是以不便舰队登陆为由，建议拆掉了围帐和木桩，可以管窥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影响下卫三畏怀柔的行事风格。

此外，卫三畏在佩里黑船远征日本中的“出色”表现，成就了其身份的重大转变。原本身为传教士的他因为在外交方面的杰出表现被美国政府重视，接替伯驾成为美国使团在华的秘书翻译，开始了长达20年的对华外交生涯。这种身份的转变，不仅反映了卫三畏个人才能的多元性，也体现了19世纪中期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对宗教人士的重视与利用。辞去外交职务后，卫三畏回国在耶鲁大学开设中文课程，成为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客观上，也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过贡献。他注重分析文化对社会带来的具体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学界对汉学及东亚研究的发展进程，也堪称是一位文化使者。

参考文献:

- [1] 卫斐列著. 顾钧等译.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37, 44, 113, 118, 136, 140, 142, 219.
- [2] 顾钧. 七个日本漂流民的故事 [J]. 博览群书, 2012(9): 99.
- [3] Williams, S.W., & Bridgman, E.C. The Chinese Repository [J]. vol.6. Maruzen Kabushiki Kaisha, 1837: 209.
- [4] 顾钧. 《中国丛报》中有关日本的论述 [J]. 东亚文化交涉研究=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2010(3): 219.
- [5] Hunt, M.H.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
- [6] 井野辺茂雄. 幕末史概説 [M]. 中文館書店, 1930: 38.
- [7] 王晓露. 试论“黑船来航”事件与日本开国的必然性 [J].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1(2): 56.

- [8] 洪晓纯. 麦都思对 God 之汉语译名的思考历程探微 [J]. 宗教学研究, 2022(2): 224.
- [9] 黄涛. 卫三畏与近代中美条约外交关系 [J]. 太平天国及晚清社会研究, 2021(1): 118.
- [10] 郭满. 开国序曲——1837 年美船“马礼逊”号的日本之行 [J]. 海交史研究, 2020(1): 82.
- [11] Bailey, J.M. Obituary: Samuel Wells Williams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1884, 16: 191.
- [12]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67.
- [13] 刘颖. 卫三畏的中国文化观 [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2021: 43.

From Missionary to Diplomat: Samuel Wells Williams and His Influence on Japan's Opening

YE Zhi-che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s the global order underwent restructuring, Western powers began to covetously eye East Asia. Against this historical backdrop, missionaries, as an unofficial yet influential group, spontaneously engaged i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culture, religion, the dissemi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iplomacy. Among them,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Samuel Wells Williams leveraged his extensive influence on the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and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Japan's opening. With his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ion's socio-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Williams became a firsthand witness to this pivotal historical event. His efforts not only expanded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East Asia but also facilitated the process of Japan's opening to the world.

Keywords: modern East Asia; the opening of Japan; missionary diplomacy; Samuel Wells Williams